

中医学“援物比类”方法的应用特点与评价

李如辉* 王荣平

浙江中医药大学,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文路, 310053)

* 通讯作者: liruहितd@eyou.com, (0571)86613763

[摘要] “形”与“气”之间、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援物比类”, 意味着“形”与“气”、自然与社会之间不可通约性的消失, 也构成了中医学“援物比类”方法应用上的特点。中医学在多数情况下将“援物比类”与其他方法联合应用, 这无疑有助于提高结论的可靠性。“形”与“气”、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援物比类”, 就气一元论哲学而言, 在逻辑上是自洽的, 因而, 也就提供了西方类比方法视野之外的运用范例。“援物比类”应用上存在着泛化倾向。

[关键词] 中医学; 援物比类; 应用特点; 评价

中医学的“援物比类”方法与西方的类比接近, 但又有着自身应用上的诸多特点, 鉴于这些特点可能的潜在价值, 本文拟作一探讨, 并立足于其相应的哲学自然观予以评价。

1 “援物比类”方法应用上的特点

1.1 “形”与“气”之间的“援物比类”

1.1.1 从“形”到“气”的“援物比类” 从“形”到“气”的“援物比类”, 近似于从实体(形态、结构)的相似或密切联系, 推导出属性(作用、功能)的相似或密切联系。这种应用在《黄帝内经》及中医学理论的构建过程中确实大量存在着。如《灵枢·师传》云:“五脏六腑者, 肺为之盖。”“华盖”最初是一关于肺位置最高的解剖概念, 但《灵枢·九针论》却作了如下解释, 曰“一者, 天也; 天者, 阳也。五脏之应天者肺; 肺者, 五脏六腑之盖也”。于是“华盖”(解剖)便转化为人体之“天”、“阳”之功能含义。后世一脉相承, 无不在功能上加以发挥, 如《血证论·脏腑病机论》指出:“肺为乾金, 象天之体, 又名华盖, ……以其居高, 清肃下行, 天道下际而光明, 故五脏六腑皆润利而气不亢。”甚至有人从“华盖”引申出“荫护诸脏”之义^[1]。

《难经·四十一难》云:“肝独有二叶, 以何应也, ……肝者, 东方木也。木者, 春也。万物始生, 其尚幼小, 意无所亲, 去太阴尚近, 离太阳不远, 犹有两心, 故有两叶, 亦应木叶也。”在这里, 对“肝有两叶”这一解剖特点, 用“木”作了“特性”的说明。

《难经·三十三难》云:“肺得水而浮, ……肺熟而复沉。”这一解剖实验结果, 在《难经·三十三难》中同样也作了属性上的解释, 曰“肺者, 非为纯金也, 辛、商也, 丙之柔。大言阴与阳, 小言夫与妇, 释其微阴, ……其意乐火, 又行阳道多, 故令肺得水而浮也。肺熟而复沉, ……故知辛当归庚”。

此外, “以脏补脏”的临床实践其理论依据无疑也根植于“援物比类”。其实际应用也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内涵: ①以动物的解剖实体器官补治人体相应解剖实体器官的病变; ②以动物的解剖实体器官补治人体相应的非解剖实体的功能病变。

1.1.2 从“气”到“形”的“援物比类” 从“气”到“形”的“援物比类”近似于从属性(作用、功能)的相似或密切联系推导出实体(形态、结构)的相似或密切联系。如“肺色白”(《素问·脏气法时论》)早在《黄帝内经》便具有功能的含义。因为肺之解剖色泽并非白色, 肺色白是因肺属金, 金与白对应, 故有“肺色白”之说。但后世却在解剖色泽上进行了比类, 如《医贯·内经十二官论》云:“脏腑内景, ……喉下有肺, 两叶白莹。”文中“脏腑内景”即指解剖的内景而言, “白莹”与表述解剖形态的“两叶”对举, 亦说明“白莹”指解剖色泽而言。《灵枢·本脏》云:“白色小理者, 肺小; 粗理者, 肺大”。又该篇在“肺合大肠, 大肠者, 皮其应”的前提下, 提出“肺应皮。皮厚者, 大肠厚; 皮薄者, 大肠薄; 皮缓腹里大者, 大肠大而长; 皮急者, 大肠急而短; 皮滑者, 大肠直; 皮肉不相离者, 大肠结”。这里通过皮肤的色泽、纹理以及厚、薄、缓、急等形态结构的特点, 推知肺之大小、大肠之厚、薄、长、短、缓、急、直、结等解剖学知识。显然这种认识是在以表知里方法得出肺合大肠、外应皮毛结论之后, 从皮肤的结构形态推知肺、大肠的结构形态。在这里获取解剖知识的手段(解剖方法)显然已嬗变为以表知里。

1.2 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援物比类”

1.2.1 从社会到自然的“援物比类” “黄帝曰: 余愿闻针道, 非国事也。岐伯曰: 夫治国者, 夫惟道焉, 非道, 何可小大深浅, 杂合而为一乎”(《灵枢·外

揣》)。治国惟道,治身惟道,治病亦惟道,而道无二致,“道无双故曰一”(《韩非子·扬权》)。“天道无亲”(《老子·第七十九章》)。因此,在《黄帝内经》看来,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援物比类”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正是《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素问·气交变大论》《素问·著至教论》《灵枢·逆顺肥瘦》等)。运用社会关系模式来比类说明人体脏腑的生理机能及其相互关系,在《黄帝内经》亦并不少见。其中最典型而又最系统者当推《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心者,君主之官也,……肺者,相傅之官,……肝者,将军之官,……胆者,中正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脾胃者,仓廪之官,……大肠者,传道之官,……小肠者,受盛之官,……肾者,作强之官,……三焦者,决渎之官,……膀胱者,州都之官……”。于此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该经文之“十二官”之“官”当释为“官职”,即系社会官职名称^[2]。这种把人体脏腑与国家机构相比类,李约瑟称之为“国家类比”,并且指出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古代中国,古代西方亦然^[3]。

1.2.2 从自然到社会的“援物比类” 1973年,医学人类学家利班(R. W. Lieban)提出了“从医学方面来阐明社会文化现象”的主张^[4]。这一“用解析生命密码的方式昭示人类社会的文化形态和历史规律”的研究方式,甚至被认为是“人类理性世界所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5]225}。但就中医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演进历史看,这种从生命、自然到人类社会的“援物比类”研究模式却只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正因如此,陈乐平先生把“阴平阳秘”、“五行配属”、“五行相生”、“五行相克”、“五行乘侮”称为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的“生命模式”^{[5]258-305}。

2 “援物比类”方法的评价

2.1 多数为与其他方法的联合应用,有助于提高结论的可靠性

理论上“援物比类”尤其是比类推理存在着单独应用与联合应用的可能,但就《黄帝内经》的实际而言,比类推理多数情况下则又是与其他方法联合应用的。其具体情形是:或具有解剖学基础,或具有生理病理观察依据,或经过临床选择机制的甄别。西方类比法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从思维进程来看,类比推理主要是从个别到个别的推理,其前提和结论通常都是关于个别事物对象的断定;二是类比推理的结论不一定是可靠的。运用类比推理时,前提为真,结论却未必真。作为归属于类比法的“援物比类”同样具有类比的以上特点,即“援物比类”的结论具有

或然性。中医学“援物比类”方法与其他方法的联合应用,对于克服结论的或然性、提高结论的可靠性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2.2 “形”与“气”、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比类,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提供了西方类比方法视野之外的运用范例

“形”(近似于实体、形态、结构)与“气”(近似于属性、作用、功能)、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援物比类”,除上文所述外,在本草学上也有着相同的用例,即将药物的功效与药物的形色等联系在一起进行比类。如白色入肺,豆象肾而补肾,参象人即补人;又如以枝通肢,桑枝可活通筋骨,治四肢痹证;柳枝可解表,治四肢沉重;桂枝通行十二经,性走窜,亦与树木枝条达伸展的特性一致。又花轻浮在植株上端,故很多花类药物走上焦。反之根茎类的药物相对质重沉降,故多走中下两焦。

这种认识逻辑在西方也曾经出现过,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发现野生兰花有两个球茎,在形态上与睾丸有着“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从形态的类似推导功能的类似。于是兰花就被认为具有生殖器官的神秘特征(因此,兰花同时又以其性淫而为世人所知)”^[6]。

对于“形”与“气”之间的比类逻辑,批评的观点是集中的,甚至认为不值得一驳。如安贝托·艾柯说:“形态上的相似不可能成为因果关系的证据”,“野生兰花与睾丸之间的类比是错误的”^[6]。徐联认为,“其实这里应用取象比类说理,恰好是将从实践中得出的结论与对这些结论的主观比喻解释混为一谈。致使中药疗效实在而理论玄乎,反让人们怀疑其疗效的真实性”^[7]。

对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比类逻辑,洪立平认为,“传统中医学……以人文价值为中心的文化精神更使这一应用科学未能向着科学技术和逻辑的完善化发展”^[8]。其实中医学在古代数千年时间内一直按其固有的方式应用着“援物比类”方法,研究和审视该方法及其应用的动议源于外来文化思想冲击。即是说,只在外界提供了另类的视角和标准的情况下,“援物比类”的理论认识和实践才被横遭质疑。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与其纠缠于东西方类比的比照优劣,还不如加意于“援物比类”自身,对该方法的评价也只有立足于其相应的哲学自然观,才具有逻辑的一贯性。

应该承认,立足于“援物比类”相应的哲学自然观,“形”与“气”、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援物比类”在认

识逻辑上是自洽的。因为“气”(指本体论意义上的“气”)凝成“形”(包括人形)属阴、“气”(指本体论意义上的“气”)散成“气”(指与“形”相对而言的“气”,即弥散运动,又称“虚空”)属阳,即所谓“阳化气,阴成形”(《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形”与“气”、阴与阳、凝聚与弥散之间存在着相互转化的关系。又“气”(指本体论意义上的“气”)生成人,而人的本质又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同时人又是“形与神俱”的有机整体,因此,就中国古代哲学气一元论看来,“形”与“气”、自然与社会是统一的。儒家“四书”中的《大学》明确序列学术活动的有机链条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袁立先生认为,该链条序列“也即指出了人文研究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指南的道法自然原则”^{[10]2}。“也就是说,在国学内部,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社会科学都是以诚意、正心、修身这些人文科学为必要的联系环节,直接扎根于格物致知这些自然科学。或者说,国学是将自然规律直接应用到人文科学再贯穿到社会科学的体系”^{[10]11}。陈可冀院士也认为,中国传统医药学“是人文主义科技的典范”,“基线是人文与科技共轭的”^[11]。

人文与科技共轭是一种理想,对于中医来说却是史实。同时“形”与“气”、自然与社会之间“援物比类”所产生的诸多中医学理论成果,至少不是完全错误的。承认人类文化及其价值的多元性,与其苛责“援物比类”的科学性,毋宁说“援物比类”提供了西方类比方法视野之外的运用范例。

2.3 “援物比类”应用的泛化倾向

吉江曾指出:“我最尊重我们可信赖的老师——类比,它知道大自然的全部奥秘……”^[12]。“援物比类”对于中医学理论的构建有着重要的方法学意义,但其“万物毕同”(《庄子·天下》)的气一元论哲学基础,又不可避免地“援物比类”导入泛化的轨道。事物固有其“同”的一面,但亦有其“异”的一面,是“同”、“异”的对立统一。由此看来,察同非即“智”,

察异亦非即“愚”,惟夫“合同异”者^[13],方可称“智”。

3 结论

“援物比类”方法有着区别于西方类比的自身应用上的诸多特点,特点可以进行如下归纳:①“形”与“气”之间的“援物比类”;②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援物比类”。中医学“援物比类”方法在多数情况下为与其他方法的联合应用,这有助于提高结论的可靠性;“形”与“气”、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援物比类”,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并提供了西方类比方法视野之外的运用范例;“援物比类”方法应用上存在着泛化倾向。

参考文献

- [1]黄建庄.试论“肺主一身之气”[J].北京中医学院学报,1989,12(4):11.
- [2]程士德.内经讲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45.
- [3]潘吉星.李约瑟文集·中国与西方在科学史上的交往[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98.
- [4]G. M. Foster and B. C. Anderson. Medical Anthropology [M]. John Wiley & Sons, New York:1978:9.
- [5]陈乐平.出入“命门”——中国医学文化学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 [6]安贝托·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M].北京:三联书店,1997:59-61.
- [7]徐联.在中医理论形成过程中类比思维的功与过[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10(9):14-16.
- [8]洪立平.中医学中“人”的概念界定是中医学现代化的切入点[J].广州中医药大学学报,2001,18(2):185-188.
-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58.
- [10]袁立.中华自然国学纲目[M].香港:中国国学出版社,2008.
- [11]陈可冀,王一方.五四以来传统中医命运与选择[J].医学与哲学,1999,20(9):26-28.
- [12]吉江.科学发现方法学分析[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99.
- [13]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中国哲学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5.

(收稿日期:2012-05-04;修回日期:2012-05-31)

[编辑:黄健]

(上接第1601页)

2011年9月22日二诊:服药7剂后,结块较前明显减小,继服上方。

按:本例患者由于早期使用了大量抗生素及过用了寒凉中药导致右乳结块质硬不消。万老师以温通散结,活血化瘀为治疗原则,选用吴茱萸、干姜、肉桂温通乳络;桃仁、红花、赤芍活血化瘀;川芎活血行气;柴胡、枳实、香附疏肝解郁,调畅气机。其中川芎、郁金乃血中之气药,柴胡、香附气中之血药,四药

合用以助瘀血消散。当归活血补血,佐以熟地黄滋养阴血,二药和用蓄攻补之效,破瘀血而不伤新血,补新血而不滞瘀血,攻补兼施,祛邪而不伤正。并同时运用白芥子、夏枯草化痰散结。

参考文献

- [1]林毅,唐汉钧.现代中医乳房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3:1401.

(收稿日期:2011-11-04;修回日期:2012-01-17)

[编辑:洪涛]